



1937年10月，新四军部领导人合影。左起：陈毅、项英、袁国平、李一氓、朱克敏、粟裕、叶挺

忠诚：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最为宝贵的品格

■ 曹春荣

1937年12月13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，高度肯定了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，在极艰苦的条件下，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，号召全党同志学习他们的“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决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”。“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”，是指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等中枢机关，于1934年10月上中旬离开中央苏区，开始战略突围（即长征）后，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，以及地方武装、地下党组织（以下统称红军游击队，简称游击队）。笔者以为，学习他们的斗争精神与顽强意志，首要的是学习他们对党、对人民、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，因为这是他们

斗争精神和顽强意志的基石，也是他们最为宝贵的品格。



忠诚是不忘初心

1934年10月上旬，为了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胜利果实，也为了消减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引起的社会震荡、群众恐慌，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，以及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

央军区。同时留下了以红24师（只有2000余人）为主力的军地武装力量1.6万余人，连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、伤病员，约3万人，归他们指挥和保护。而中央交给项英他们的任务是：牵制国民党军，掩护红军主力转移；保卫中央苏区，破坏进占苏区的敌人的统治，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反攻，恢复失地。

相对于各种力量都很强大的敌人，相对于肩上的担子，项英他们真可谓势单力薄，困难重重。加之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占据地域的反复“清剿”，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日渐萎缩，内部的失败情绪蔓延，逃跑和叛变现象频发，战斗力不断削弱。在最初的三个月里，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，一些重大决策得不到党中央的及时指导和批准，项英他们更是难上加难，几陷绝境。

在如此困境险局下，项英、陈毅和游击队的大多数人不忘初心，坚持斗争，战胜了自我的消极思想与情绪，终于战胜了各种困难，战胜了敌人，迎来了胜利。这个初心，就是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的：中国共产党把实现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；就是党的二大关于党章决议案要求的：“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，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”；就是苏区时期的党员入党誓词强调的：“严守秘密，服从纪律，牺牲个人，阶级斗争，努力革命，永不叛党”；就是《中国工农红军誓词》宣示的：“我们是工农的儿子，自愿来当红军，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，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”；“我们是苏维埃柱石，誓以我们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，实行土地革命，推翻国民

党，保障苏维埃，打倒帝国主义，争取中国解放，武装保卫苏维埃，完成革命，为社会主义前途斗争”。

为着大家不忘初心，项英和陈毅牢牢抓住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关键，不断对红军指战员、地方干部进行革命形势、革命前途、革命传统、革命气节的教育，引导、鼓励大家不怕困难、敢于斗争，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，越过黑暗、迎来曙光。

1935年4月上旬，项英和陈毅在开启赣粤边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时刻，在大余县河洞乡长岭村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，进行动员与部署。项英在报告中强调要正确认识革命形势，反对失败情绪。他指出，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，苏区虽失掉，但主力红军存在和游击战进行，不仅有新的发展，而且将推动新的形势到来。强调要反对一切悲观失望，坚决进行游击战，为恢复苏区而斗争。

陈毅接着讲话。他首先针对盲目乐观情绪指出，大发展暂时做不到，红军必须接受中央苏区丢掉的教训，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和斗争方式，彻底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，才能坚持下来。他着重针对悲观情绪指出，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，因为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新的、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，一个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，迟早要到来。他为大家描绘了抗日战争爆发、红军大发展的光辉前景，预想了现在的几个人发展为几十人、几百几千乃至几万人的队伍的局面。

项英和陈毅的言辞中肯而富有激情，所说道理浅显而深刻，给大家以极大的教育与振奋。

1935年10月中旬，叛变后已出

任粤军少将“剿共游击司令”的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，制造了袭击北山游击区、致使我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的“北山事件”。项英、陈毅得悉后，十分震惊和悲痛。他们连夜研究，决定在党内和游击队内开展阶级教育与红军优良传统教育，赞扬为革命光荣牺牲，谴责为保命可耻叛变，加强说服教育，搞好内部民主，以防止叛变事件的再次发生。

一次，陈毅在一支游击队了解到有个战士逃跑后又回来的事，便趁机对全体队员进行教育。他恳切地说：“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非常艰苦，打死、病死、饿死随时都可能发生。身体弱的，跑不动的，不能坚持，可以自愿回家，我们发给路费。不过出去了，要站稳立场，不要叛变，不要去当反革命，不要翻脸为仇。不要不辞而别，要握手告别，后会有期。出去了，待不住，愿意回来的可以回来。”他当众表态：“你们别看我面黄肌瘦，长着满脸胡子，我是要在地方坚持斗争的，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，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。”他的话深深地感染了大家，队员们纷纷表示要坚持到底，绝不动摇。

稍后，项英在信丰县潭塘坑和担任警卫任务的战士谈心时，也进行了这样的教育。他说，现在我们处在最困难的时期，我们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同志有随时被打死、饿死、病死的可能，我们要有随时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。“但是，我们即使剩下一个人，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，共产党的红旗不能倒，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，革命的火种不仅消灭不了而且还会燎原，燃遍万里江山。黑暗总会过去，光明必然会到来。当然，在这样艰难的时刻，总会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，开小

差的、叛变的都有可能发生。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除掉了沙子，金子会更加闪闪发光。”1936年4月，项英还亲自起草了长达6000多字的《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》，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下达，在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中组织学习讨论，进行革命气节教育，开展反叛徒斗争。

经过不断教育，大家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，坚守了革命初心。



忠诚是永葆本色

红军是工农武装，是工农子弟兵，和游击区的地方干部一样，他们都来自普通人民群众，和人民群众利益攸关，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。因而，勤劳俭朴、艰苦奋斗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、为人民群众谋幸福，就是他们的政治本色、阶级本色。保持这种本色，就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。

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，身处强敌包围、封锁、“清剿”之中，只能栖身于深山老林。生命安全、疾病防治、糊口果腹、御寒衣物、信息沟通、打击敌人等，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与配合。这使得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保持政治本色、阶级本色的极端重要性，认识到要紧紧依靠群众。

为永葆本色，项英和陈毅反复教育红军游击队战士，要牢固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。陈毅常常对大家说，我们的全部地盘，就是这么几个“岛子”，但是我们有着浩瀚的海洋作依托，那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。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，没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

结，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。

为永葆本色，项英和陈毅要求红军游击队时时、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利益，与群众同甘共苦。农忙时，要帮助群众收割、耕种。对欺压群众的保甲长，要设法规劝、警告，使其收敛。对群众痛恨的作恶多端的地头蛇，要坚决惩治，为民除害。对被国民党军抓去的群众，要设法营救。因而，游击队走到哪里，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，亲如一家，得到群众的保护与支援。

为永葆本色，项英和陈毅强调越是困难的时候，越要注意执行政策，宁愿自己多受苦，也不能加重群众负担。不能把游击战争变为单纯的打土豪筹款。打土豪，要严格执行阶级路线，绝不能把富农当豪绅地主打，更不能损害中农利益，商人的合法利益也应保护。项英还及时总结红军游击队群众工作经验，编写了《群众工作必读》小册子，详尽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、方针和方法，指出群众工作做得好坏，是检验游击队工作的尺度。

为永葆本色，项英和陈毅以身作则，面对饥寒交迫而依然乐观从容，身藏不少金条却能坦然公开。“北山事件”发生时，项英他们为避开叛徒袭击，转移到一处森林隐蔽。这时什么东西都丢了，饭也没得吃，到第三天连水都没得喝了。但项英毫不气馁，鼓励战士们坚持下去，终于到达目的地。项英和陈毅身上都藏着组织上交给他们作为活动经费的金条，被少数战士发现后悄悄议论开了。两人为此商量后，决定把事情向大家讲明白。一天，他俩把金条、银圆、钞票摊开放在桌上，对大家说：“这是党的经费，党要我们保管，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。发展党的事业，要

靠这笔钱；发展部队，也要靠这笔钱。现在，形势越来越紧张，我们有责任通知大家，万一我们牺牲了，尸首可以不要，钱无论如何要拿走。这是党的钱，不能落到敌人手里。”项英、陈毅的坦荡心胸、廉洁风范，深深地感动、教育了战士们。战士们从而对他们更加信任、信服，进而对革命前途更加坚定了信心。

像项英、陈毅这样身藏金条而不乱花的共产党人，还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。1935年初，刘启耀在于都南部突围时被冲散，跟部队失去联系。他不敢回家，便隐姓埋名，在遂川一带行乞讨米。可是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衣着破烂的乞丐，原来竟是堂堂省苏主席，且腰间缠着一大包金银。因为这包金银是由他保管的党的活动经费，刘启耀宁愿自己讨米度日，也不动用一丝一毫。他一边沿路讨米，一边串联散落在遂川、万安、泰和一带的革命同志。1937年初，刘启耀在泰和马家洲召集一批苏区领导干部开会，决定成立中共江西临时省委，这才将珍藏了两年的金银拿出来，用作省委办公经费。

正是有了这样一大批不忘初心、坚守本色、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人率先垂范，南方各省游击战争才能在群众支持下进行三年之久，“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，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”。



忠诚是百折不挠

在强敌挤压、“清剿”下长期坚

持游击战争，有着许许多多想得到与想不到的困难，诸如随时可能被敌人发现、偷袭；随时可能出叛徒，被其出卖诱捕；没有粮食接济，要忍饥挨饿，三月不知肉味更是平常事；衣单被薄难以御寒，甚至在风雨中只能靠彼此抱团取暖；生病受伤却缺医少药，只能用土方草药对付，或者强忍久拖；还有讨厌的蚊叮虫咬，难耐的孤寂愁绪，失去上级指示的彷徨犹豫；等等。情况瞬息万变，前路渺茫。能否在敌人面前、困难面前不动摇、不屈服，而依然意志坚强、品节刚毅，成为衡量红军游击队是否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忠诚的试金石。

项英、陈毅等以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，经受住了敌人、疫病和自然环境给予的种种残酷考验，显示出他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。那些考验有多残酷，看看陈毅回忆的一段话便可略见一斑。他说：

三年游击战争，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。整年整月在山里睡，外面跑。春天雨水多，全身都是泥巴，两个多月没干过。吃的是野菜、杨梅、笋子和蛇。根本不是人过的生活，像野兽一样。在那三年中，我只进过两次房子……三年看见四次山外的老百姓……这样的生活容易使人感到前途渺茫。再加上敌人经常不断地封锁、“围剿”，斗争就更加艰苦。因此，在游击队内部容易发生动摇、逃跑甚至叛变的情况。……由于环境的恶劣，战争的伤亡，死人的事天天有，加上得不到补充，原有一千五六百人的游击队，最后只剩下三百多人了。

面对敌人的进攻、“清剿”、诱降，项英、陈毅他们毫不畏惧、视死

如归。能战则战，不能战也要尽力保存自己，积蓄力量再战，绝不屈服于敌人的软、硬两手。

1935年春，赣南党政军机关率领独立6团，离开仁风山区突围时，遇到敌人的强势堵截，许多战士倒在血泊中。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多次负伤仍坚持战斗，子弹打光后被敌人捕去。在狱中，他严词拒绝了敌人的劝降，坚贞不屈，最终英勇就义。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上了年纪，体质又差，而且长期带病工作。当他走到牛岭正指挥战斗时，一颗流弹击中他的胸口。他喘着气高呼：“为革命战斗到底！”然后缓缓倒下。何叔衡、贺昌、瞿秋白等留下打游击的苏区领导人，以及游击区县委书记曾纪才等，也都是为了苏维埃、为了新中国视死如归、宁死不屈的革命好儿郎。

在山上打游击，不仅后勤无保障，还要时时防备敌人偷袭，因此吃不好、睡不好、休息不好是常事。项英、陈毅和红军游击队队员不气馁、不畏缩，想方设法依靠群众予以应对解决。断了粮，就吃野菜、竹笋、山果、马蜂幼虫和蛹，或者捉蛇、捉田鸡吃。没有房子住，就在山林中搭草棚、竹棚，或者用一块油布在四周树上绑住四个角做帐篷；实在没条件，就几个人背靠背席地而眠。

对付生病伤痛，能寻医就诊就寻医就诊，不然就扯草药、找土方对付。实在没法可想时，也用出人意料的蛮法子解决。陈毅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右腿负重伤，红军主力长征前夕，他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开了刀，取出了体内一些弹片，但伤口一直未能愈合，时常流脓血，痛得他龇牙咧嘴。一天，他到林子里挤伤口的脓

血，痛得没劲了，就叫警卫员接着用力挤。警卫员含着眼泪挤，竟然把之前手术未取净的弹片挤出来了。没想到，此后陈毅的腿伤竟奇迹般痊愈了。

对付孤独寂寞，项英、陈毅他们常用的办法，一是组织大家开会、学习，讨论形势，商量对策，学马列著作和苏区文件，以及自编教材。二是讲故事、说笑话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甚至《红楼梦》里的故事、段子人人爱听。三是条件允许时，就地观风赏景，吟诗作赋，弹琴下棋，以充实精神来战胜孤寂。四是注重理想和前途教育，引导大家于黑暗中看到光明，透过敌人表面的强大，看到他们没落的下场，克服眼前困难，迎接胜利的到来。



忠诚是知错即改

如果说，百折不挠是不忘初心、坚持真理，是忠诚的一面，那么，知错即改也是本着初心修正错误，是忠诚的另一面。倘若明知错了，还不醒悟、改正，那只会离初心、离本色越来越远，以致背道而驰，何谈忠诚？

项英、陈毅他们在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，由于对形势判断的失误，对内部离心倾向估计不足，对群众在敌人高压下产生的复杂心理分析不够，还因为情绪急躁、方法欠当等原因，也犯过大小不一的错误。但他们以革命事业、群众利益为重，不断吸取教训、提高认识、知错即改，从而坚持了下来，取得（下转第80页）

联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经验，提出了几条标准，对左翼文学起了示范和倡导作用。《北斗》不仅是左联的战斗阵地，也是当时上海的文学园地，它刊登不同文学观念、文学风格、文学体裁的作品，团结了非左翼的作家，发现并培养了文学新人，被文学史家杨义的《中国新文学图志》肯定为“容量丰厚，建树斐然”，具有“母亲胸怀”，能准确体悟把握文学规律的文学期刊，从而使它的意义“超出了左翼之外”。这一切均需通过出版得以展现，小小的湖风书局，是功不可没的。

据金树望回忆，他们的书店在楼下，而楼上就成了左联成员及左翼人士的秘密聚会和活动场所，他曾亲眼见过鲁迅、茅盾、史沫特莱等人在上边聚会。金树望也常到丁玲、姚蓬子（诸暨人）等人处去做

一些联络工作。

湖风书局不仅出版了一批左翼作家的革命性、战斗性强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译作，还出版了鲁迅推荐的插图精美、揭示人性、表现人性的译作《夏娃日记》和《勇敢的约翰》。

在《鲁迅日记》《鲁迅书信集》中，记载了有关孙用译《勇敢的约翰》一书在湖风书局出版的情况。鲁迅曾为其校稿、收版税及寄书、寄钱。

从鲁迅日记和书信中我们可以得知：一，当时左翼作家出版著作或译作十分困难，鲁迅为出孙用翻译的匈牙利革命诗人的诗集历时两年，不仅要冲破白色恐怖之困难，而且要费周折与书店打交道，以至于鲁迅曾“赌气”想自己出钱印行此书。二，在困境中一家小店——湖风书局解决了出

版问题，使“裴多菲的一种名作，总算也介绍到中国了”，了却了鲁迅一桩心愿。

所以阳翰笙才说，宣侠父寻找资金办湖风书局，对左联和文总来说真是“雪中送炭”！

湖风书局从1931年创办，到1933年被查封，历时两年。

在书局成立后，为了左联开展活动，阳翰笙第二次找宣侠父筹钱。据金树望回忆，宣侠父不仅从梁冠英处又筹措到一笔“相当可观的”经费，甚至还捐过自己私人的钱。

现代文学史家，请不要忘记宣侠父——一位长期隐蔽于敌营，在敌军营垒中战斗而未能公开亮相左联文坛的革命作家、革命先烈。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两本书加入了左联。他还为左联创办了“唯一的自己的出版机构”——湖风书局。■

（上接第75页）了胜利。

主力红军突围后的头几个月里，项英寄希望于他们打胜仗，重返苏区，故迟迟未能改变领导方式和斗争方式，也没有很好地准备转变，因而吃了亏，部队损失很大。

1935年春，项英得到党中央从长征途中发来的指示后，痛定思痛，终于认识到先前的错误，进而和陈毅等一道，提出了“依靠群众，坚持斗争，积蓄力量，创造条件，迎接新的革命高潮”的游击战争方针。自此转入以游击战争为中心的思考与实践中去，开创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。

游击队一度有过单纯打土豪，没有发动群众的工作，且游击主义习气浓厚，不注意政策，侵害了群众利益，导致群众不满。项英、陈毅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，迅

速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诸如加强政治、纪律、政策教育，反对游击主义等倾向，反对单纯打土豪，打土豪要严格执行阶级路线等，从而很快改正了此前的错误做法，赢得了民心。

为着巩固内部，防止动摇逃跑现象发生，游击队曾经对此实行过严管、狠斗、追杀的办法，结果弄得互相猜忌、人人自危。项英、陈毅认为这样“巩固内部”不行，这是自乱阵脚、自挖墙脚的做法，是帮了敌人害了自己。进而改用说服教育、革命自愿、民主管理、经济公开，领导带头艰苦奋斗，以及善待逃跑后又回队的人等举措，稳住了局面，安定了军心。

在随时改正错误，维护党的形象和群众利益、革命事业方面，项英、陈毅等人作出了榜样。他们拿起批评

和自我批评的武器，跟自身、跟同志中存在的各种不正确、不健康倾向进行斗争，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，以理服人、以情感人。项英、陈毅等人还善于总结经验、吸取教训，并且及时传达给大家，使之成为共同的精神财富，以至成为此后各个革命阶段的宝典。

以上所述，只是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忠诚品格的部分表现。但这足以让我们看到那些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，钦佩他们为共产主义理想、为人民大众幸福而战斗而牺牲的勇气与智慧。■

封面图片说明：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的骑兵部队

封底图片说明：志愿军部队在炮火掩护下突破了“联合国军”临津江防线